



用全面的历史的方法研究中共党史

——读毛泽东的《如何研究中共党史》

□ 赵纪萍

核心阅读

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重要讲话中，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共党史研究的目的、对象，并对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这对今天研究中共党史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延安时期是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时期，毛泽东亲自主持收集整理党的六大以来的主要历史文献，先后编辑出版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等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文献。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结合全党学习《六大以来》的具体情况在中央学习组作了《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重要讲话，指出要用“全面的历史的方法”研究中共党史，把“整个党的发展过程”作为研究对象，“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才能“对今天的路线和政策有更好的认识，使工作做得更好，更有进步”。那么，如何用全面的历史的方法研究中共党史呢？从根本上讲，就是要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党的历史置于近现代中国发展的历史乃至中华民族5000年发展的历史中加以考察，将党的历史置于国际国内两个环境中加以分析，对党的整个历史进行系统地、客观地、全面地研究。

研究中共党史要走进历史

首先，研究中共党史要走进历史，将问题还原到其产生的社会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因此，毛泽东提出，研究中共党史要注意“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学会把微小的历史细节放到宏大的历史背景中进行系统性、全局性的把握。

历史是具体的阶段性的演进，搞清楚历史分期是中共党史研究的必要前

提。毛泽东提出历史分期的研究方法，把党的历史分为大革命时期、内战时期、抗日时期，通过分析党的斗争目标、打击对象和政治路线在各个历史时期呈现出的不同特点和相互联系，动态描绘党的历史发展进程，总结各个历史时期的经验教训，不仅厘清了党的历史的是非功过，而且搞清楚了中国共产党“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些根本性的问题，构建起中共党史研究的逻辑起点。

研究中共党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要走进历史，把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结合其所处时代和社会历史条件进行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之间的关系，更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毛泽东对辛亥革命客观公允的评价就体现了这一点，他认为辛亥革命“并不能说完全失败”，而是“有它的胜利，它打倒了直接依赖帝国主义的清朝皇帝。但后来失败了，没有巩固它的胜利”。可见，只有走进历史研究中共党史，才能正确了解和把握中共党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从中汲取历史经验，更好地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

研究中共党史要有贯通视角

研究中共党史还要有贯通视角，贯通历史与现实，在宏阔的历史纵深与历

史比较中分析、说明问题，既要实事求是地研究历史的本来，又要实事求是地追溯历史的所以然，不局限于对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的历史的研究，而要以人类社会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为基础不断深化中共党史研究。

毛泽东主张以党的历史演进的客观过程为根本依据追溯历史的本源、把握历史的全貌，提出研究中共党史要有贯通视角。他指出，“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只从一九二一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的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因为“现在有很多东西直接联系到那时候”，“不说明以前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对于共产党的成立和以后的历史，也就不能说得清楚”。只有以贯通的视角研究中共党史，才能把握历史的全貌，才能实事求是地讲清楚历史的本来和所以然，而以贯通的视角研究中共党史最为关键的就是在人类社会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中共党史研究。

毛泽东正是立足于中国近现代史，以贯通的视角研究中共党史。《外力、军阀与革命》《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等著作都是他立足于中国近现代史深化中共党史研究的代表作。他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论述、关于近代中国社会阶级结构和主要矛盾的剖析以及关于近代中国社会各个发展阶段特点的阐述，为他深化中共党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以贯通

的视角研究中共党史，就要放宽视野，把党的历史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历史中加以考察，在历史比较中理解中共党史、解读中共党史，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中共党史研究。

研究中共党史要兼具国际视野和中国情怀

毛泽东指出，研究中共党史既要考察外部环境和国际形势，体现国际视野，又要坚持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立场，体现中国情怀。研究中共党史兼具国际视野和中国情怀有利于科学全面地认识当时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从而更加客观、全面地分析党情。

一方面，中共党史研究要具有国际视野。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国际社会的风云变幻是中共党史研究中不可忽视的外部因素，并自觉地以宽阔的国际视野研究中共党史。他在研究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时特别注意联系当时的国际形势、外部环境进行分析，从而得出关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更加科学、全面的认识和结论。此外，毛泽东强调研究中共党史要把“整个党的发展过程”作为研究对象，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与世界的发展是紧密相连的，而且也深刻改变和影响着国际社会的发展和秩序。毛泽东关于中共党史研究对象的论断本身就要求中共党史研究要具有国际视野。

另一方面，中共党史研究要具有中国情怀。如何体现中国情怀呢？毛泽东主张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明确提出中共党史研究必须以中国为中心，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发展，否则我们的研究就不会有结果，就不能解决中国问题。与此同时，毛泽东批评了党内存在的“一切以外国为中心”的风气以及不顾中国实际生搬硬套外国模式的做法，进而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来解决中国问题。

《如何研究中共党史》奠定了中共党史研究的方法论基础，为中共党史研究迈上新起点、开辟新境界、取得新成果提供了重要指南。

“朝抵抗力最大的路径走”

——朱光潜的治学之道

□ 王晓兵

朱光潜（1897—1986年），字孟实，安徽桐城人，著名美学家、教育家、文艺理论家和翻译家，我国现代美学研究领域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他学贯中西，融会古今，成为中国美学史上一座横跨古今、沟通中外的“桥梁”，享有崇高的国际声誉。朱光潜读书治学从不贪懒取巧，而是奉行“朝抵抗力最大的路径走”的治学理念，一生兢兢业业，勤于治学。他具有悟透人生的大智慧，他的著作及译作成果丰厚，在《朱光潜全集》中，如《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美的人生》《我是怎样学起美学来的》《谈修养》《谈立志》《谈谦虚》《谈读书》等，为我们呈现了他在人生修养、为人处世、读书治学等方面的独到见解。仔细体味其在读书治学方面所蕴含的真知灼见，对我们今天的读书治学大有裨益。

“人要有出世的精神，才可以做入世的事业”

朱光潜主张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他在《美的人生》中说，“人要有出世的精神，才可以做入世的事业”，认为“无论是讲学问或是做事业的人，都要抱一副‘无所为而为’的精神，把自己所做的学问事业当作一件艺术品看待，只求满足理想和情趣，不斤斤于利害得失，才可以有一番真正成就”。

朱光潜认为，“名位是中国学者的大患”，“现世只是一个密密无缝的利害网，一般人不能逃脱这个圈套，所以转来转去，仍是被利害两个大字系住”。要想在读书治学方面有所成就，必须要端正心意，因着理想和情趣去做，不应为物欲所蔽，要以超越的心态去做事，要有“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价值意识。有的青年学子以功利自欺，入学校只图混

资格做敲门砖，对学问没有浓厚兴趣，终将难有真正建树。为干禄而求学，或得禄而忘学，皆是本末倒置。

朱光潜在少年时代曾提出“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朱光潜一生恬淡、简朴、克己持重，不追求物质上的享受，对美学研究拥有浓厚的兴趣，并沿着浓厚的兴趣去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从青年时代起，朱光潜就好学不倦，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即使到了垂暮之年，他仍然抖擞精神，“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焚笔疾书，直至最后一息。著名学者钱念孙曾这样说：“朱光潜的学术人生，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既轰轰烈烈，又静穆隽永，既清澈似水，又凝重如山，是一部浅近而深邃的大书。”

“要有大成就，必定朝抵抗力最大的路径走”

朱光潜主张做学问要有超强的意志、迎难而上的奋斗精神。他在《谈修养》一书中谈到，“在立身处世的任何方面，贪懒取巧都不会有大成就，要有大成就，必定朝抵抗力最大的路径走”。但世间往往有很多人的惰性大于意志力，喜欢朝抵抗力最低的路径走，遇到该做的事，拿不出一点勇气去做，遇到不该做的，而拿不出一点勇气去决定不做，只一味因循苟且，

偷安取巧，缺少奋斗的精神，他们在道德、学问、事功各方面终将难以有所成就。

在香港大学求学时，朱光潜曾以“恒、恬、诚、勇”这四个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其中的“恒”和“勇”，很好地诠释了他无论做人做事，都持之以恒、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朱光潜对这四个字终生恪守不渝。他认定了抵抗力最大的路径，就坚持勇往直前，孜孜以求，笃志不废，终成美学界泰斗。

朱光潜在欧洲留学期间，兴趣广泛，学习了文学、心理学和哲学等，但经过比较和思索，他发现美学是文学、心理学和哲学的共同联络线索，也是他最感兴趣的学科，并决定把研究美学作为自己的奋斗事业。当时朱光潜在英国爱丁堡大学时的哲学导师——康德哲学专家侃普·史密斯教授并不主张朱光潜研究美学，并告诫他，“美学是一个泥潭，玄得很，既不能实证，又不能用严格的逻辑推理”。朱光潜经过认真思考后，并没有接受导师的建议，而是决定不畏惧困难，选择了“朝抵抗力最大的路径走”，全身心投入到美学研究中，最终结出了累累硕果。

朱光潜进入耄耋之年，依然坚持选择“朝抵抗力最大的路径走”，翻译了难译的巨著黑格尔的《美学》和维柯的《新科学》。国学大师季羡林曾感叹说，“他译完了黑格尔的美学，又翻译维柯的著作。这些著作内容深

奥，号称难治，能承担这种翻译工作的，在世没有第二人”。而朱光潜以他渊博的学识和精湛的外语水平，以顽强坚毅的意志力，克服病痛，争分夺秒，锲而不舍，终于完成了这项艰巨的工作，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博学终须能守约，先打游击后攻城”

朱光潜治学既主张广博，又强调精深。他在《谈读书》中强调，“不能通就不能专，不能博就不能约。先博学而后守约，这是治任何学问所必守的程序”。宇宙本为有机体，世间绝没有一科孤立绝缘的学问，因此做学问若没有广博为基础，便难以真正做到专，其见解观点也难免偏蔽。读书治学“有如金字塔，要铺下一个很宽广笨重的基础，才可以逐渐砌成一个尖顶出来。如果入手就想造一个尖顶，结果只有倒塌”。

朱光潜一生在美学研究领域享有崇高的声誉，他的美学成就源于他的博学。朱光潜在《我是怎样学起美学来的》一文中曾提到，他前后在几个大学里做过14年的学生，“学过许多不相干的功课，解剖过鲑鱼，制过染色切片，读过建筑史，学过符号名学，用过熏烟鼓和电气反应表测验过心理反应”，在兴趣的驱使下，他什么都学，喜欢文学、心理学、哲学，也学习过历史，为了解希腊文学和艺术，在爱丁堡大学时曾选修了欧洲古代史，了解过西方的城

◀用典释义▶

相通则共进

相闭则各退

【讲话原文】

各国应该坚持开放融通，拓展互利合作空间。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国际贸易和投资等经贸往来，植根于各国优势互补、互通有无的需要。纵观国际经贸发展史，深刻验证了“相通则共进，相闭则各退”的规律。各国削坚壁垒、扩大开放，国际经贸就能打通血脉；如果以邻为壑、孤立封闭，国际经贸就会气滞血瘀，世界经济也难以健康发展。各国应该坚持开放的政策取向，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提升多边和双边开放水平，推动各国经济联动融通，共同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各国应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减少负面外溢效应，合力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各国应该推动构建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促进全球经济进一步开放、交流、融合。

——习近平：《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2018年11月5日）

【出处】

图书所载，四五千年红黑黄白之族，民皇帝王之政，兴亡倚伏，狎主扶舆，何莽然其不一致也！然求其公理，蔽一言，不过相通则治进，相闭则治退而已。相通之用奈何？横牖异说，校其旨趣，以甲例乙，以丙例丁，博涉深思，择其至当，一家之学，万国之书，乃相待而得定论焉。

——（近代）严复：《〈国闻汇编〉叙》（《国闻报》，1897年11月24日）

【解读】

“相通则共进，相闭则各退”，是对严复《〈国闻汇编〉叙》中“相通则治进，相闭则治退”的化用。习近平改字以立新意，赋予原典以新的时代内容，指出国家与国家之间相互沟通交流就能共同进步，相互封闭隔绝就会各自退步。

严复，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报人，其创办的《国闻报》《国闻汇编》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在维新运动中起到思想启蒙作用。

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严复把“闭”看作是造成中国所有问题的根源，认为只有“通”才能起到振衰起敝的作用。他提出“通上下之情”“通中外之故”，而尤以“通下情为要义”“通外情为要务”。在《〈国闻汇编〉叙》中，严复又提出“相通则治进，相闭则治退”，认为相互沟通交流治理能力就进步，相互封闭隔绝治理能力就后退。并指出“事有古今，贵通则一”，强调了“通”在时代变迁中的重要性。

面对风云变幻的世界经济大潮，2018年11月5日习近平主席在首届进博会主旨演讲中，高屋建瓴地指出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并揭示出“相通则共进，相闭则各退”的历史规律。习近平主席指出，国际贸易和投资等经贸往来，植根于各国优势互补、互通有无的需要。各国应该坚持开放的政策取向，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提升多边和双边开放水平，推动各国经济联动融通，共同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中国推动更高水平开放的脚步不会停滞！中国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脚步不会停滞！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脚步不会停滞！”在逆全球化暗流涌动，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甚嚣尘上的当口，习近平主席掷地有声的三个“不会停滞”，如同阳光穿透乌云，照亮了世界的期待。遵循“相通则共进，相闭则各退”的历史规律，新时代的大国开放姿态令人振奋，同心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举世瞩目。迈向更高层次开放的中国，将不断带给我们勇气和定力，也将不断带给世界惊喜与希望。

（杨立新）

自传》中描述，朱光潜在英法留学的8年中，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大英博物馆和学校的图书馆里，“一边阅读，一边写作”。虽说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穷，需要靠稿费吃饭，但同时，朱光潜也发现“边阅读、边写作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方法，这样学习比较容易消化，容易深入些”。

做学问光读不写不行，写才会读得更认真。为了写，就要把所学的问题多费些心思来把原书吃透，要把所谈的知识在自己头脑里整理一番、思索一番，整理自己的思想和斟酌表达的方式，增强思想的条理化和系统化，使原书作者的思想经过消化，变成自己的精神营养。就如同吃饭，将食物加以消化之后才能变为生命的动力，否则食而不化，只会有害无益。朱光潜在学生时代就写了《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文艺心理学》《谈美》《诗论》《变态心理学派别》《变态心理学》等著作，还译出了朱光潜美学思想最初来源——克罗齐的《美学原理》。他在1925年至1933年欧洲留学期间，共写作、翻译了11部著作，成为当时无数留学生的治学楷模。

朱光潜还指出，光写不读也不行，学习得太少，写得太多太杂也无益。为了弄清某个问题，就得多读些相关的资料 and 书籍，逐渐深入到问题的核心，领会其要义，逐渐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和思考能力。仅读了两本书就要写，自己还未吃透就要搞创造，难免粗制滥造，养成武断和不老实的习惯。如果这样下去，不但对治学无益，还会对文风和学风起败坏作用。

“边阅读、边写作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方法”

朱光潜主张治学要注重写作，虽然写作是一项非常辛苦的事情，但要克服惰性，勇于“朝抵抗力最大的路径走”。边阅读、边写作有助于将知识系统化，正所谓学问是“由记忆生思想，由因袭创造”，只有经过组织和创造，才能使知识成为有机体，将“死”知识变“活”。据《朱光潜